

“回流儿童”，回乡生活要如何更好安放

本报记者 奚冬琪 肖亮升



近年来,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以及部分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很多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回流儿童”群体。这些从小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对新环境并不适应,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使得他们在学业、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受到多重影响。

如今,人口的大量外流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必然现象,但长期以来,随之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近年来,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以及部分地区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很多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回流儿童”群体。这些从小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对新环境并不适应,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干预,使得这些孩子在学业、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受到多重影响。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与“非回流儿童”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此外,“回流儿童”患抑郁类疾病的比例也较高,达到了64.26%。因此,如何才能使“回流儿童”群体尽快融入新生活,让他们健康成长,也成了很多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关心的问题。

外出务工大市面临的新问题

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四大城市,也是仅次于省会南宁的广西第二人口大市。因为紧邻经济发达的广东,这里还是广西排名第一的人口输出城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玉林市外出人口达到124.3万人,占本市常住人口比例的21.4%,户籍人口比例的16.8%,外出人口总量甚至超过了区内常住人口体量最小的防城港市,平均每户就有0.8人外出。

外出人口多,“回流儿童”自然也多。据玉林市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2月,玉林市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生103.2万人,其中“回流儿童”总数为1.1万人,占比1.09%。从回流源看,从外省或

国外回流3702人,从县外区回流5445人,从县内回流2127人。根据回流原因分类,主要是因父母返乡回流4243人,因招生政策回流4111人,因缺人照顾回流1022人。

“‘回流儿童’问题不仅在我们玉林有,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因为玉林外出务工人员多,所以更突出一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玉林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广西区委会副主委、民建玉林市委主委杨正川和玉林市人大代表、民建广西区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玉林市委专职副主委麦信敏一直很关注“回流儿童”群体,这些孩子返乡后在学习、生活等多方面出现的“水土不服”现象,让他们十分忧心。

早在几年前,麦信敏带队下乡帮扶时,就经常遇到“回流儿童”。“当时我们在村里的一户人家走访,听说他家有个孩子是从广东的大城市回来的,我想着这孩子应该是见过世面的,就想和他聊聊天,可没想到孩子见了我们就跑,根本不愿意交流。”麦信敏说,开始她以为是孩子害羞,可后来去村里的次数多了,和大家都熟悉了,孩子还是不肯和她说话。家里人说,回村后,孩子性格就变得孤僻了。“还有些孩子回来后成绩大不如前,初中毕业就去读了职业学校,回来后也还是很难沟通。”

村里的所见所闻让麦信敏关注到了“回流儿童”群体,此后,她开始和同样关心这一问题的杨正川主委一起调研,收集相关资料。

回流回乡,却难有回家归属感

杨正川和麦信敏了解到,“回流儿童”回乡后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因为受学习环境改变影响,而导致的成绩下滑问题。

“大部分孩子从城市的繁华环境一下子回到偏僻的乡村,对新环境不适应,不少孩子逐渐产生心理落差,由

于父母远在他乡,无法倾诉,这种落差得不到及时排解宣泄,进而影响学习。部分学生甚至萌生了辍学念头。”杨正川提到,玉林市的“回流儿童”大都来自临近的广东省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著名的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虽然地理位置相近,生活习俗相差不多,但生活条件却有较大差距,所以很多孩子回到家乡后都不习惯。

据玉林市教育部门和当地学校的数据显示,全市“回流儿童”中出现成绩下滑的有1525人,占比13.53%;厌学671人,占比5.95%;旷课逃学136人,占比1.21%。再加上各地教材、学习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不同,以及“回流儿童”需要适应新的校园环境,新的老师同学,也导致部分“回流儿童”学习成绩下降。尤其在中学阶段,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有15.7%的学生出现了成绩下滑情况。

除了学习成绩,“回流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突出。由于与父母骤然分离,且和父母的见面频次变低,使得这些孩子失去了原有的亲情归属感,孤独感和负面情绪也陡然增加,心理压力增大。“特别是大部分‘回流儿童’回到家乡后,他们的父母仍旧外出务工,导致孩子一下子变成了留守儿童,这对于他们来说,一时很难适应和接受。”麦信敏说,在当地的一些学校中,有近80%的“回流儿童”变成了留守儿童,且这些孩子的家长往往几个月甚至更久才能回来一次。而这些孩子因为从小不在村里长大,又与照顾他们的祖父母辈交流较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心理障碍。

“出现心理问题以及受家庭监护人改变的影响,这些孩子极易发展为‘问题儿童’。”让杨正川和麦信敏感到担忧的是,“回流儿童”回到家乡后,多数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长辈看管,因祖辈学识有限,年龄跨度大,难以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学习辅导,对思想教育、人格培养更是无能为力,家庭教育十分薄弱。有的“回流儿童”对新群体

不适应,网络依赖度高,出现厌学、逃学情况,叛逆性较强。据调查统计,玉林市“回流儿童”中存在不良行为习惯的有452人,其中被人欺凌的就达到18人。

麦信敏说,一位初中学校的校长曾向她反映,学校里有“回流儿童”带领其他同学一起“逃学”的情况。这类“回流儿童”凭借自己开阔的眼界、超群的胆识和善于沟通的能力,很快融入新环境,结交新朋友,导致乡镇的同学对“回流儿童”产生一种崇拜感,让“回流儿童”产生膨胀心理,从而成了新的校园霸凌者。

解决“回流儿童”问题,户籍改革、心理疏导、乡村振兴一个都不能少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如何才能让“回流儿童”摆脱“水土不服”,重塑健康心理,尽快融入当地生活,杨正川和麦信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进户籍和招生制度改革,减少人为产生‘回流儿童’。”杨正川呼吁,应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升学机制,降低异地户籍考生初高中入学制度门槛,让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在城市享受同等教育。同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队伍建设,采取顶岗置换、网络研修、送教下乡、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多种形式加强乡村教师培训,稳步提升农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另外,杨正川还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回流儿童”数据库或相关管理系统,搭建“回流儿童”关爱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回流儿童”服务活动。特别是应加强对“回流儿童”的心理疏导,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帮助他们解决入学、升学等问题。

而在麦信敏看来,除了这些针对现有“回流儿童”问题采取的手段,从长远来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回流儿童”,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根本方法。

“这也是我们在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应该被忽视的问题。”麦信敏认为,应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村创业的配套政策,如设立农民创业贷款的专项资金,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放宽、简化农村建房的审批手续,让更多的厂房落户农村,加快农村的开发与投入,改善农村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扩大地方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消化或就近转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切实增加农民的本土就业岗位,切实从源头上破解“回流儿童”难题。

市场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联手,加强对电商平台预售商品的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平台和商家进行刚性约束。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对“超长预售”加强整治,规范行业行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宣传典型案例。可通过设置微信小程序、官方网站投诉、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程,从重从快处置,精准快速帮助消费者维权。同时,要向社会面进行广泛宣传,倡导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通过投诉、向法院起诉等渠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督促电商平台建立预售预警机制,要求商家在销售页面显著位置标注预售商品的价格、期限、质量、发货日期、退货条件等,并约定违约责任。平台加强对商家的审核监管,及时发现超长预售等不良行为,超出合理预售期限的商品不予上架,对盲目预售和随意变更、“任性”撤单、一味延迟发货等行为

大连市中山区:

四级委员“同堂献策” 城市老街再现繁荣

曲曼丽 吕浩

“天津街改造要站在对城市、对市民、对历史负责的角度,从长计议,久久为功。”日前,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政协举办了一场“阵容”不小的专题协商座谈会——除了邀请全国、省、市、区四级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同堂献策,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及党政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悉数到会,现场听民意,只为做好“青泥洼——天津街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

始建于1909年的天津街是大连商业的发祥地,但近年来,这条承载着城市几代人记忆的街道渐渐落寞,改造天津街、振兴天津街,已成为全市人民的一大期盼。今年,大连市委、市政府将“青泥洼——天津街步行街改造提升”列为年度重点工作,提出要高品质打造、专业化运营、精细化管理,以商业街区“再改造”推动业态“再升级”,实现消费“再繁荣”。

上述目标要如何才能顺利实现?按照区委要求,中山区政协精心筹划,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诸葛亮”。

在全国政协委员,台盟辽宁省委会主委胡军看来,天津街改造提升是大连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步行街商业布局一定要“接地气”,要聚焦“逛”字做文章,满足市民的“逛街”需求。“天津街改造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更加广泛地吸收市民意见,做到中、短、长期目标相结合。”胡军说。

围绕提升天津街文化品位,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京剧院院长杨赤希望将宏济大舞台纳入天津街改造规划,充分发挥宏济大舞台文化重地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天津街相互助力、双向发力,提升商业街区文化品位,助推区域文化振兴。

“应注重天津街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高档次、高品质、高格调、体验性强的文化设施和文旅项目。”辽宁省政协委员,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辽宁省建议高度重视业态布局,认真调查研究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人们对商业街的新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特色化服务。

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现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学国提出,大连服装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固,可在天津街建立“全球服装发布中心”,积极嫁接国际时装周主流资源和系统,纳入国际顶尖服装时尚发布运作系统,促进大连服装时尚业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相交融。

大连市政协委员,辽宁东北亚文旅集团CEO车爽的设计是:在天津街建设集观

赏性、参与性为一体的“老字号”“非遗”文创集市,打造“非遗”+娱乐+餐饮+直播+文创的“非遗”文化街区,使之既有现场表演的“非遗”节目,也有现场制作的手工艺。

“还要改造好、利用好现有文化产业项目,把天津街的历史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中山区政协委员,大连可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万涛说,天津街是一条红色街区,大连很多的革命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应深挖天津街“红色资源”,就地建立多处历史事件纪念场所。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天津街改造要找到与时代、与消费者的共鸣。”中山区政协委员,大连盛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浪大连总经理高欢建议通过传统主流媒体平台讲观点、社交媒体做热点、视频媒体平台做卖点等途径,形成全媒体融合传播,让品牌传播渗透在天津街改造的每一个“时间点”。

听了各位委员的发言,大连市作协主席索素认为,天津街曾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大连人的集体性格,要重塑天津街形象,加入怀旧题材,激起大连人的群体记忆,重新找回精致、雅致、有品位的自豪感,把天津街改造成能够“闲闲地逛、细细地品、慢慢地看”的地方。

区政协主席高侃才注意到,会议期间先后有50多个词语反复被提及,包括“时尚”“雅致”“历史”“文化”等。于是,他将大家的精彩建言归纳为“五个融合”:天津街改造提升要与大连传统、民俗和百姓习惯相融合、与大连文旅发展相融合、与本地优势产业相融合、与东北亚国际化相融合、与城市更新和总体规划相融合。

“各位提出的意见建议弥足珍贵,有助于政府部门科学准确把握天津街改造的方向和工作重点,会后将认真梳理、研究吸纳。”听罢13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独到见解,区长赵云峰当场表明态度:商业街改造将坚持问计于民、问计于企业,尊重民意、尊重市场,靠尊重聚人心,靠服务暖人心。

“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感动、深受启发。”区委书记张洪喜表示,区政协搭建的这个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沟通交流的协商平台,把信心传出去,把建议留下来,形式非常好,希望区政协将这一形式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继续围绕党政中心工作,聚焦主题主线,汇聚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大连市中山区:

四级委员“同堂献策” 城市老街再现繁荣

曲曼丽 吕浩

“天津街改造要站在对城市、对市民、对历史负责的角度,从长计议,久久为功。”日前,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政协举办了一场“阵容”不小的专题协商座谈会——除了邀请全国、省、市、区四级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同堂献策,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及党政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悉数到会,现场听民意,只为做好“青泥洼——天津街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

始建于1909年的天津街是大连商业的发祥地,但近年来,这条承载着城市几代人记忆的街道渐渐落寞,改造天津街、振兴天津街,已成为全市人民的一大期盼。今年,大连市委、市政府将“青泥洼——天津街步行街改造提升”列为年度重点工作,提出要高品质打造、专业化运营、精细化管理,以商业街区“再改造”推动业态“再升级”,实现消费“再繁荣”。

上述目标要如何才能顺利实现?按照区委要求,中山区政协精心筹划,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诸葛亮”。

在全国政协委员,台盟辽宁省委会主委胡军看来,天津街改造提升是大连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步行街商业布局一定要“接地气”,要聚焦“逛”字做文章,满足市民的“逛街”需求。“天津街改造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更加广泛地吸收市民意见,做到中、短、长期目标相结合。”胡军说。

围绕提升天津街文化品位,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京剧院院长杨赤希望将宏济大舞台纳入天津街改造规划,充分发挥宏济大舞台文化重地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天津街相互助力、双向发力,提升商业街区文化品位,助推区域文化振兴。

“应注重天津街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高档次、高品质、高格调、体验性强的文化设施和文旅项目。”辽宁省政协委员,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辽宁省建议高度重视业态布局,认真调查研究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人们对商业街的新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特色化服务。

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现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庄学国提出,大连服装产业起步早、基础牢固,可在天津街建立“全球服装发布中心”,积极嫁接国际时装周主流资源和系统,纳入国际顶尖服装时尚发布运作系统,促进大连服装时尚业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相交融。

大连市政协委员,辽宁东北亚文旅集团CEO车爽的设计是:在天津街建设集观

赏性、参与性为一体的“老字号”“非遗”文创集市,打造“非遗”+娱乐+餐饮+直播+文创的“非遗”文化街区,使之既有现场表演的“非遗”节目,也有现场制作的手工艺。

“还要改造好、利用好现有文化产业项目,把天津街的历史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中山区政协委员,大连可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万涛说,天津街是一条红色街区,大连很多的革命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应深挖天津街“红色资源”,就地建立多处历史事件纪念场所。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天津街改造要找到与时代、与消费者的共鸣。”中山区政协委员,大连盛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新浪大连总经理高欢建议通过传统主流媒体平台讲观点、社交媒体做热点、视频媒体平台做卖点等途径,形成全媒体融合传播,让品牌传播渗透在天津街改造的每一个“时间点”。

听了各位委员的发言,大连市作协主席索素认为,天津街曾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大连人的集体性格,要重塑天津街形象,加入怀旧题材,激起大连人的群体记忆,重新找回精致、雅致、有品位的自豪感,把天津街改造成能够“闲闲地逛、细细地品、慢慢地看”的地方。

区政协主席高侃才注意到,会议期间先后有50多个词语反复被提及,包括“时尚”“雅致”“历史”“文化”等。于是,他将大家的精彩建言归纳为“五个融合”:天津街改造提升要与大连传统、民俗和百姓习惯相融合、与大连文旅发展相融合、与本地优势产业相融合、与东北亚国际化相融合、与城市更新和总体规划相融合。

最高法推出百集民法典学习“微课堂”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推出的《学法典读案例答问题》栏目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微博及中国法院网正式与公众见面。栏目共100期,每日更新1期,原则上每期设置“学起来”“读起来”“答起来”3个学习板块。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一个人的一生。民法典普法是

“八五”普法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为积极引导全体公民深刻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人民法院持续推进民法典普法宣传。该栏目于民法典施行以来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及时推出,旨在助推公民提升法治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学法典、用法典的良好法治氛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规范“6·18”网络集中促销经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艳红)6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全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关于规范“6·18”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以下简称《工作提示》)。

《工作提示》明确要规范集中促销行为,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管理,引导平台内经营者诚信经营,规范有序开展促销活动;防范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对假冒伪劣商品及其经营者及时采取禁限措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广

告发布行为。提升广告审核水平,严禁虚假宣传、低俗内容,有效拦截虚假违法广告;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时妥善化解网络消费纠纷等。

《工作提示》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指导平台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履行法定义务;强化监测监管,严格查处“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期间的违法违规行;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力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根据全总统一部署,按照《关于2022年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全总机关8个组、32名干部陆续前往8个蹲点单位,开展为期3个月的蹲点工作。

2022年全总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将继续深入未建工会、工会工作比较薄弱、劳动关系情况比较复杂单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和县级以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资政建言

“超长预售”亟须“超强监管”

丁波澜

近年来,消费者发现,在各大网购平台上,以预售模式出现的产品越来越多,且预售时间越来越长,有的甚至超过45天。同时,“预售不告知”“超出预售时间发货”“虚假发货”“随意更改发货日期”“无货被退款”等乱象也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消费体验。在微博发起的“你如何看待电商超长预售的做法?”投票中,仅有不足3%的网友能理解商家这种行为,另有近45%的网友选择“预售可以,但‘超长’不行”。

笔者调查发现,超长预售备受诟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商家规避风险。目前,由于疫情影响物流快递不畅通,致使商品发货时间无法明确,收货时间无法预期。商家担心延迟发货被买家投诉以及大批量退单,选择弹性预售来规避风险。还有就是避免存货风险。如服装行业款式更新频繁,商家以预售模式“试水温”,

事先锁定部分用户,利用经营优势地位,将产品备货的库存成本、时间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

二是商家“饥饿营销”。部分商家将预售模式作为营销宣传和流量增长的手段,故意制造“奇货可居”的假象,以此吸引消费者。尤其是部分热门产品,甚至会有多个预售阶段,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

当网店预售成为普遍现象时,消费者由于缺少选择只能被迫接受,而平台作为媒介缺少正向的引导,也导致这种不公平交易的“野蛮生长”,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此建议:

修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增加“预售时间不得超过7天”,即“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内容,且预售时间不得超过7天。”

市场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联手,加强对电商平台预售商品的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平台和商家进行刚性约束。市场监管部门要主动出击,对“超长预售”加强整治,规范行业行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宣传典型案例。可通过设置微信小程序、官方网站投诉、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简化处理流程,从重从快处置,精准快速帮助消费者维权。同时,要向社会面进行广泛宣传,倡导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通过投诉、向法院起诉等渠道,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督促电商平台建立预售预警机制,要求商家在销售页面显著位置标注预售商品的价格、期限、质量、发货日期、退货条件等,并约定违约责任。平台加强对商家的审核监管,及时发现超长预售等不良行为,超出合理预售期限的商品不予上架,对盲目预售和随意变更、“任性”撤单、一味延迟发货等行为

纳入考核,利用扣分处罚、信用等级管理、黑名单等手段来敦促商家整改。同时,平台建立便捷的投诉通道,加强实时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预售乱象并上报至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快速治理商家违规行为,以法律手段解决诸多预售乱象,最终达到根治的目的。

按照《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2020修订)》规定,平台需出台预售款监管措施,明确预售款需要留在平台上,由平台承担起第三方存管资金管理责任。如果商家不能按期发货,可由平台按照消费者的意愿,将预售款原路退还;如果消费者同意延期,由商家支付延期补偿金,以降低消费者的风险;如果商家始终不发货,或者在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商家单方面中止合约,平台可以扣除其保证金,并赔偿给消费者,以提高商家的违约成本。

(作者系农工党党员、浙江省丽水市政协特邀信息员)